

环境公共事件的符号再造与修辞实践

——基于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的符号学分析

刘 涛

(暨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是近些年影响极为严重的一次环境公共事件。底层话语的修辞实践体现为对一切可能的符号体系进行符号化处理,使其成为舆论再造的“场”。这一过程离不开语境的意义赋值体系,而伴随文本语境和场合语境发挥了极为重要的符号召唤与意义再造功能。符号化过程往往会诉诸于特定的接合实践,即将环境议题置于环境正义主义话语框架中,最终“以话语的方式”开展社会动员工作。一般来说,“符号化实践→语境生成实践→话语接合实践”可以视为环境公共事件研究的一种可供选择的符号学分析框架、路径和方法。

【关键词】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环境公共事件;符号学;语境;接合实践;环境正义话语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无疑是近些年最严重的“人造风险”^[1]之一。2014年4月11日下午16时,兰州市人民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兰州自来水苯含量严重超标,并规定24小时内全城停止饮用自来水。消息一出,一座300万人口的城市迅速陷入集体恐慌。实际上,4月10日15时,兰州威立雅水务公司就已经检测出自来水苯含量超标,最高监测值为200微克/升,超出国家限值的10微克/升的标准多达20倍。从4月10日15时到4月11日16时,信息延迟发布至少超过了24小时。^[2]

其实,早在3月初,兰州市民就反映自来水存在刺鼻异味,全国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但官方坚持认为水质安全,并“对无中生有、造谣的相关人员进行了查处”。^[3]考虑到4月10日检测出苯超标的水样采自4月2日,《中国青年报》随之抛出了一个更加刺痛人心的结论:“到4月10日,兰州人已经最少喝了8天含苯的水,最多有可能持续了一个多月。”^[4]当这些数字叠加在一起,无疑制造了一场大面积的社会恐慌。

人是符号的动物,^[5]人通过符号来表意,通过控制意义生成的方式来运用权力,实现控制和统治,但同样人也经常通过对既有符号的反转操控来改变意义的方向,实现对权力的反抗。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一切公共事件都是围绕着符号而展开的意义对抗和权力争夺。符号学也因此越来越广泛地进入公共事件的研究视野。^[6]鉴于此,本文以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为例,重点分析近年来困扰中国的环境公共事件中底层话语的修辞实践,并尝试提出符号学分析环境公共事件的一般路径和方法。

一、符号化与社会动员的符号实践

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之所以成为一个公共话题,离不开其在公共媒介上的符号化实践。符

【作者简介】刘 涛,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2014年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基金基础性研究课题《环境传播的基本理论与典型案例库建设研究》(141099),2012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视觉修辞的意义生产机制及典型案例库建设研究”》(12JHQ056),2013年甘肃省财政厅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视觉修辞与公共议题构建机制研究》(130029)。

号的直接功能就是表意，只有携带意义的事物才能称为符号。所谓符号化，就是赋予事物以意义的行为和过程，其结果是将非符号变为符号。“只要符号化，哪怕看来完全没有意义的，也可能被解释出意义。”^[7]符号化从什么时候开始？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给出的答案是“表现与内容相关时”^[8]。换言之，当事物开始呈现出“表现”（expression）念头和欲望时，符号化行为已经开始了。一块石头本来没有意义，可是一旦刻上文字变成印章，那就成为符号，即主体或身份意义不在场时的指涉物。符号化的过程，离不开人类的选择和使用行为。这也是为什么罗兰·巴特敏锐地指出，任何事物一旦成为人类的使用对象，就会符号化。^[9]换言之，当事物进入人类的关照体系下，它便从穆卡洛夫斯基所说的“前符号实践”（presemiotic praxis）阶段中“挣脱”出来，进入意义表征维度的“符号功能”（semiotic function）阶段。^[10]但是，符号化即片面化，“符号不等于符号载体，不等于载体的所有可感知品质，而是载体所提供的感知与意义之间的关系。”^[11]片面化时已经决定了符号的意义方向和意图定点。因此，谁来发起符号化，以及如何符号化，就等于决定了意义的生产权。

在环境公共事件中，一般来说，主流话语牢牢地掌控着对符号的命名、发布、解释和使用权力，即它拥有意义的最大生产权。所谓官方信息发布的瞒报、迟报、漏报、误报等现象，本质上都可以视为符号学意义上的符号权力滥用——法制话语之外的一系列非协商性的、非对话性的符号操控行为。如果将底层话语纯粹视为边缘的、从属的、被动的话语方式，那完全是低估了底层话语的修辞实践和对抗能力。类似于斯图亚特·霍尔在文本解码中提到的“对抗式解读”策略，底层话语最常见的对抗方式就是基于“拿来主义”的“借巢孵卵”策略，即在主流话语体系中寻找一切可能的漏洞和破绽，使其成为挑战主流话语合法性的修辞资源和话语符号。^[12]“七十码”、“俯卧撑”、“躲猫猫”、“我爸是李刚”、“临时性强奸”、“休假式治疗”、“一个艰难的决定”等符码都来自于主流话语的陈述体系，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时代被符号化的流行语，根本上是因为这些符码碎片被刻意提取出来，并置于一种对抗性的解释语境和意义框架中。显然，符号化过程对应的是符号意义的替代性生产实践，本质上体现为一种迂回的、游戏式的、赌博式的“批判性修辞实践”（critical rhetorics）。

在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发生后的两个月内，法制话语迟迟“缺席”，^[13]底层话语的修辞智慧便转向对一切可能的“自然符码”的符号化处理。符号化的结果是，将“自然符码”从其原始的沉默状态、不在场状态、前符号状态中激活，作为舆论再造的话语“据点”参与了“对抗性话语”^[14]的生产与争夺。这些被符号化的事物包括：兰州市委书记在新闻发布会中称政府“问心无愧”；5月10日央视《新闻调查》节目中兰州城乡建设局冯乐贵局长称延迟24小时上报是因为“半夜里不敢打扰领导睡觉”；多年前郎咸平抨击威立雅水务公司的一段视频《兰州水价模式，谁来埋单》；4月13日被公众调侃为“老天怒了”的天降冰雹现象；恒大集团免费派发冰泉过程中出现的“矿泉水去哪儿了”网络造句行为……显然，在底层话语的符号化实践中，那些原本默不作声的、躲在暗处的事物被识别、被激活、被生产，聚拢在一起，成为一个个人为构造的话语符号，在制造公共围观上发挥了神奇的社会动员功能。

在视觉文化时代，公共议题构造很大程度上诉诸于图像化的表征途径和方式。^[15]在底层话语所征用的批判性修辞实践中，“图像政治”（image politics）是一种最常见的社会动员方式，即通过制造“图像事件”（image events）来建构“问题”和“争议”，从而将其推向公共商议空间。^[16]从符号学意义上讲，“图像政治”就是对图像进行符号化处理，即将其从茫茫符码体系中特别挑选出来，并赋予其某种对抗性的指涉意义，成为舆论生产与再造的“场”。在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中，为缓解兰州市民的饮水困难，恒大集团迅速调集了1200万瓶恒大冰泉进行免费派发。“矿泉水去哪儿了”一时间成为底层舆论的质疑焦点，其中最激烈的声音是指责矿泉水被政府有意“截流”了。真正掀起舆论波澜的则是网友拍摄的一张图片：恒大冰泉送水车停在兰州市公安局七里河分局门前，工作人员正在将车上的水搬至公安局楼上（见图1）。在由愤懑和恐慌共同浇筑的特殊语境中，这张图片迅速被符号化了，成为底层对抗性话语附着并顽强生长的“据

点”：图像的直接意指致力于还原新闻事实，含蓄意指则直接上升为针对政府公信力的信任危机。

如果说底层话语运作的基本修辞实践体现为对事物的符号化过程，接踵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哪些事物最容易被符号化处理，这些被特别选择并赋予意义的事物具有什么特征？答案往往指向一个重要的符号学概念——“刺点”（Punctum）。刺点是罗兰·巴特在《明室》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意为一种“说不出名字”的“刺激物”，往往会给人们带来“十分明显的慌乱的征兆”^[17]。其实，刺点就是一些特殊的文本或文本局部，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的偶然性、破坏性和反常规性。换言之，相对于正常化的、总体性的、秩序化的文本体系，其中的某些信息点总是试图冲破框架，打破常规，与其他信息点或其他文本显得“格格不入”。从符号文本的双轴关系来看，如果说组合轴揭示的是总体文本中各要素之间的搭配和链接关系，聚合轴强调的是某个元素的选择和替换关系，而刺点“就是在一个组分上聚合操作突然拓宽，使得这个组分得到浓重投影”^[18]。可见，正如相声中的“包袱”，诗句中的“神来之笔”，影视剧中那些意味深长的“情节点”，这些“点”打破了正常文本话语的统一性，特别是组分上的聚合轴大大拓宽，形成符号文本中的刺点。

在刺点那里，意义往往最为丰满，而且增长很快，因而极易卷入一场有关意义生产与争夺的修辞实践中。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中，某些文本组分之所以被生产出来并成为舆论动员的引擎装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组分的聚合轴过于“宽泛”，最终在组合轴上出现了反常规搭配结构，即这些组分的特质远远超出了总体文本的规约框架，因而形成了符号学上的刺点。“问心无愧”之所以被符号化，是因为在官方的新闻发布所对应的的话语体系中，它是个体立场支持下的私人话语，与其在公共立场上作为官方发言人的身份相悖，也超出了新闻发布会本应“坚持”的官方话语体系，即跳出了我们常说的“官方模板”，因而成为整个文本的刺点。同样，在恒大冰泉免费派发事件中，恒大官方微博完整记录了各地的现场图片。这些图片呈现的是一幅基调一致的和谐景观：满载冰泉的卡车进入校园、社区和街道，驱走了那里的恐慌和不安，普通百姓排着长队免费领水，脸上露出了焦急而又幸福的笑容。然而，那张停靠在公安局门前的“送水”图片完全打破了这种和谐局面，走向了一种难以弥合的反结构状态，因而形成一种反常搭配的“刺点文本”。正因为这一“刺点文本”超出了常规文本相对统一的、标准的、秩序化的诠释体系，因而使得建立在“刺点文本”基础上的替代性意义生产和争夺行为成为可能。

图1：恒大冰泉送水车停在兰州市公安局门前



二、语境生成与符号意义召唤

在符号修辞实践中，语境（context）从来都不是一个默不作声的背景或陪衬，而是作为一种在场的话语元素积极参与符号意义的赋值过程。离开语境所铺设的“上下文关系”，能指与所指的勾连关系注定是浮动的、难以确认的，因为语境对符号的激活和释义过程起着重要的限定和导向作用。具体来说，语境创设了一个巨大的“语义场”，这里沉淀了某种劝服性的权力形式或意识形态，以便于接受者的释义过程可以沿着特定的认知体系和解释框架延伸开来。^[19]语境有多种分类，但总体上可以分为伴随文本语境和场合语境。^[20]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中，语境作为一种极为重要修辞实践参与了符号意义的召唤、激活与赋值过程。

（一）伴随文本语境与符号召唤

任何一个文本，都不可避免地携带着大量文本之外的信息，有些信息是文化意义上的社会约定，有些信息是认知意义上的关联对象，这些信息便构成了文本的伴随文本（co-text）。如果我们承认一个文本必然受制于特定的文化制约，而且与外部世界存在或多或少的联系，其实就是承认伴随文本对于文本解释的重要意义。^[21]伴随文本仅仅是文本“顺便”携带的某些约定和联系，一般潜藏在“暗处”，并不显现于文本之中。然而在某些特殊情境下，伴随文本会被激活，并且作为一种积极的话语元素参与文本意义的生成与建构。

当伴随文本被激活，并参与文本意义的建构，客观上便搭建了一种新的语境形态——伴随文本语境。类似于普遍意义上的互文关系，伴随文本语境揭示的是一种基于社会约定和相关联系而构造的上下文关系。早在三月初，兰州自来水就爆出存在刺鼻异味，然而官方迅速辟谣称水质安全。3月8日的《兰州晨报》头版用最醒目的大字宣布“自来水水质全面达标”，此事后来不了了

图2：3月8日和4月12日的《兰州晨报》头版对比



之。然而当四月水污染事件发生后，4月12日的《兰州晨报》头版承认“兰州市自来水发生苯含量超标事件”。由于两次自来水事件的微妙联系，再加上两份报纸在板式上的相似性，因此迅速搭建了一个互文意义上的伴随文本语境（见图3）。同时，当自来水污染事件的责任主体一直“逍遥法外”时，公众本能地将矛头指向了兰州市市长袁占亭。作为2013年被网络曝光佩戴多款名表的“故事主角”，同样“逍遥法外”的“表哥”袁占亭又成为自来水污染事件的“故事主角”。可见，自来水污染事件直接激活了其伴随文本——“表哥事件”。在二者所搭建的伴随文本语境中，早已被历史遗忘的“表哥事件”再次成为舆论焦点，在舆论动员上发挥了微妙而神奇的修辞功能。

同时，环境公共危机从来都不是一个静态的事件，而是作为福柯所说的“话语性场

域”（field of discursivity）^[22]，积极地召唤各种“为我所用”的伴随文本。当伴随文本从其原始的“隐匿”状态中被召唤出来，它便作为一个新的符号文本开始召唤其所“携带”的其它伴随文本，最终形成一个更复杂的伴随文本语境。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中，当责任主体威立雅水务公司进入公众视野，2010年段郎咸平抨击法国公司威立雅各种交易黑幕的视频《兰州水价模式，谁来埋单》迅速被舆论激活，成为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的伴随文本。正是在伴随文本语境中，这段“雪藏多年”的视频开始走向幕前，网上掀起了“威立雅滚出中国”的民族主义讨论。与此同时，一时间有关威立雅公司在中国其它城市的“斑斑劣迹”同样被召唤出来，如2013年5月海口市环保局对威立雅水污染事件进行立案处罚，2013年8月环保部对威立雅废弃物排放超标事件进行公开处罚……所有这些文本组合起来，便形成了一个更为强大的伴随文本语境，这直接将威立雅“污染门”推到了一个更为激进的网络讨伐空间。

（二）场合语境与仪式抵抗

如果说伴随文本语境是符号文本自身携带的“内部”语境，那场合语境（situational context）则是符号文本的“外部”语境。一般来说，任何符号文本都存在于特定的情景关系中，并且归属于特定的社会范畴。不同的外部情景或社会范畴总是对应于不同的符码体系和元语

言。比如“临时工”、“我爸是李刚”、“休假式治疗”、“轮流发生性关系”等网络流行语只有被置于特定的网络事件背景中才能真正理解其所指意义。

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本身就铺设了一个巨大的场合语境，所有身处其中的元素都不可避免地接受着来自语境的意义赋值压力，有些符号化行为甚至演变为一场普遍而深入的仪式抵抗行动。4月14日，也就是在兰州市委书记虞海燕宣称“问心无愧”的次日，兰州市突遭特大冰雹袭击，整个城市淹没在黄豆大的冰雹之中。这原本是一个极具偶然性的自然现象，然而在兰州水污染这一特殊的“场合语境”中，天降冰雹现象被赋予了一定的“人文意义”。在对中国古老哲学话语的征用体系中，“天怒人怨”、“老天怒了”、“这就是说假话的下场”等反讽式修辞表达开始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蔓延开来，并演变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极具仪式化的集体抵抗行为。这种仪式抵抗行为同样延续到随后的“六月飞雪”现象中。类似的仪式抵抗还发生在兰州市政府发起的“文明城市宣传口号征集”活动中。4月9日，兰州人民政府官方微博发出一则公告，面向兰州市民征集全国文明城市宣传口号。三天后，兰州自来水苯超标事件猛然袭来，这条原本沉默已久的微博迅速被激活了，成为特殊语境中的一个极具讽刺性的话语符号。底层智慧开始发力，纷纷转发这条微博，“春色里看苯海”、“春水如兰，苯源之州”、“苯出于兰，不至于兰”、“苯于水，封于信，稳于民”等反讽式“宣传口号”横空出世。于是，一场由底层话语驱动的仪式抵抗行为开始蔓延开来。

不得不强调的是，由于法制话语的“缺席”，这种抵抗行为仅仅是也注定是仪式性的，更多地体现为詹姆斯所说的戏仿性的、游戏式的、戏虐化的后现代操演行为。即便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仪式抵抗行为在公共议题建构方面依然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动员功能。

三、接合实践与环境正义主义话语生产

接合 (articulation) 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修辞实践，其目的就是将一个事物纳入到特定的话语陈述体系中，进而“以话语的方式”重新界定事物的意义和秩序。简单来说，接合的功能是建立事物与某种话语之间的关联性和对应关系，赋予事物解释一个强大的、正当的话语维度，也即提供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语境元语言。按照拉克劳和墨菲的观点，“接合是一种构建意义元素之间对应关系的意指实践，正是借助意义接合的方式，人们的认同得以建立起来。”^[23]在当前国际政治背景下，为什么一群人的“人体炸弹”行为在西方世界被称为“恐怖分子”，而在阿拉伯世界则被称为“自由战士”，本质上是这一行为被置于不同的话语框架中，或者说修辞主体使用了不同的接合实践，这使得同样的行为被赋予不同的诠释体系。我们经常说的“上纲上线”就是一种典型的接合实践。当认识问题上升为立场问题，道德问题上升为法律问题，作风问题上升为路线问题，普通话题上升到民族国家问题，其目的就是将事物置于某种集体共享的话语框架进行审视，进而“以话语的方式”赋予某种行为以合法性。在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中，环境议题的建构同样诉诸于修辞学意义上的接合实践，即致力于发现环境污染和其它话语之间的关联性，这其中常见的话语接合策略体现为对环境正义话语的再造行为。

环境正义主义话语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美国境内的“邻避冲突”事件。^[24]面对社区周围的多氯联苯 (PCB) 废弃物掩埋场，美国南卡罗莱纳州非裔社群Warren County抛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修辞学问题：为什么工业废渣要掩埋在黑人社区？于是，环境问题被巧妙地转化为种族歧视问题，少数人群的抵抗行为由此上升为一种重构美国价值观合法性的公民权利行为。当环境问题从原初的环境场域中挣脱出来，变成一个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Warren County最终“以修辞的方式”完成了环境议题的政治化表征与构造。当这一修辞手段被反复挪用，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正义主义运动普遍延伸开来，成为环境传播领域非常重要的一种新社会运动形态。

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发生之初，由于调查结果和责任主体迟迟未能公布，舆论场中的法制话语总是处于“不在场”状态，这使得舆论生成过程更多地停留在对政府和威立雅水务公司的道义

谴责层面。道义谴责往往是一种非话语性的情绪表达。由于缺少修辞学意义上的劝服力量，道义谴责注定是单薄的、暂时的、过渡性的、不稳定的，而且很容易被其它围观形式或话语方式所驱赶。反过来讲，对环境议题进行话语化建构，即将其接合到特定的话语框架中，进而“以话语的方式”赋予底层表达某种合法性与正当性，这是对抗性话语普遍共享的话语实践。在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中，环境正义主义话语悄然生成，而且被赋予了新的语境框架和意义内涵，因而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功能。

由于兰州全城自来水苯超标，政府不得不为市民应急供水。然而领水过程中，部分供水点出现了一则令人匪夷所思的规定：兰州市民凭户口本正常领水，非兰州户口人员则禁止领水或减少领水。^[25]这一话题在微博、天涯、百度贴吧等线上空间迅速升温，舆论的焦点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偏移和转向，中国特殊的环境正义主义话语开始形成。户口本就是一个被舆论刻意召唤出来的修辞资源。它已经俨然被符号化了，不单单是人口学意义上的户籍证明，而是上升为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身份标签和对立符号。底层话语正是通过对户口本的修辞建构而将环境问题转化为户籍歧视问题。跟西方环境正义话语不同，中国环境正义话语超出了种族歧视这一修辞框架，在接合实践上挪用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户籍歧视话语，所体现的是一种新的话语生产实践。

除了户籍问题，环境正义话语所征用的修辞资源同样诉诸于转型中国的贫富分化议题，即不同社会群体或阶层在环境危机事件中可能的受害程度是不同的。在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中，官方于4月11日发布自来水污染消息，48小时后即称水质达到安全标准。可许多市民疑虑未消，甚至事件过去一个月了，依然选择使用纯净水。^[26]我们关心的话题是，那些依然坚持使用纯净水的人群有什么特征？

我们的实证研究发现，在对兰州西固区和安宁区172个家庭的随机问卷调查中，家庭收入和使用纯净水时间成显著的相关关系（ $r=.735, p<.05$ ）。换言之，在公共健康危机面前，假如政府发布的水质安全数据存在掩饰或误报嫌疑，那低收入家庭更容易遭受健康伤害。其实，早在3月6日，全国数十家媒体就曾报道兰州自来水出现刺鼻异味，但官方坚持认为水质监测数据符合国家标准。^[27]其实，从那时开始，许多市民就已经开始使用纯净水，这在经济条件好的家庭那里非常普遍，而低收入家庭则因为“相信政府”而持续饮用后来被证实的可能存在风险的自来水，我们的调查结果很好地验证了这一基本事实。

显然，当官方坚持的技术理性与底层体验对应的文化理性之间存在艰难对话时，高收入家庭总会巧妙地避开风险，置身于这一矛盾体及其结构关系之外，实现对自身健康与安全的经济学救赎。纵观中国的诸多环境公共事件，瞒报、迟报和误报等“符号权力滥用”现象时有发生，^[28]当官方与公众的信息沟通处于失衡状态时，任何可能的风险最后更容易转嫁到低收入家庭那里，这个特殊的群体最终会为政府可能存在的公信力危机而默默“埋单”。而高收入家庭往往会启动耗资巨大的防范措施，如选择搬迁、购买净化设施、使用“特供”产品，最大限度地免受公共危机影响。可见，当贫富问题进入环境正义话语的解释体系，中国的环境危机进一步加剧了社会阶层间的公平与正义问题——低收入家庭不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底层群体，更是在生态危机中苦苦挣扎的“环境难民”。

总之，纵观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中环境正义话语的接合实践，环境问题被巧妙地置于户籍歧视、贫富歧视、权利歧视的话语框架中，这使得议题建构和社会动员过程获得了强大的话语支撑，而这一过程则是通过符号学意义上的文化“标出”行为完成的。按照文化符号学解释，社会文本存在诸多二元对立范畴，对立项之间往往是不对等的、不平衡的，有主/辅、正常/反常、主流/非主流、文化/反文化之分，并且还有“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中项，由此形成非标出的正项、标出的异项和中项共同构成的文化格局。正项代表的是主流话语默认的话语取向，属于正常项；中项是表面上保持中立、左右摇摆的文本意义，实际上总是不可避免地偏向一边；异项则是被主流声音排斥的异常的、边缘的表意内容。正项和中项的目的就是排斥异项，界定异项，标出异项，使异项成为文化符号学意义上的“标出项”（the marked）。在西方话语那里，东方是标

出项；在男权话语那里，女性是标出项；在和谐话语那里，恐怖分子是标出项……标出项一般存在于二元对立范畴中，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构造物。在当代网络文化的修辞体系中，“80后”、“官二代”、“富二代”、“临时工”等符码体系被特别标出，成为揭示当前社会反常状态的“标出项”。标出项往往被置于特定的话语框架和修辞语境中进行排斥和打压，使其具有“异项特征”。如面对转型时期的诸多群体性事件，官方在进行事件定性和话语表述时，总是倾向于使用“一小撮”等修辞结构，这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异项标出”行为。标出的目的主要是打击异项，排斥异项。因此，标出的异项只能是“一小撮”，而不能是“大部分”，否则树敌太多，自己就面临着正项反转为异项的可能。

进一步审视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中的环境正义话语，户籍问题和贫富问题背后的环境正义话语之所以作为一种修辞资源被刻意识别并生产出来，根本上源于对二元对立话语的生产行为。具体来说，底层话语巧妙地发现了环境传播实践中的一个二元对立范畴：兰州籍居民/非兰州籍居民、高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如果说前者是主流话语普遍接纳的正项，后者则是不折不扣的文化“标出项”。在环境正义话语的接合实践中，当非兰州籍居民、低收入家庭被有意“标出”，标出项所对应的社会群体便被建构为异常的、边缘的、不守秩序的社会存在。在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中，“标出”本身意味着一种话语建构方式。类似于福柯提到的“排除的规则”（rule of exclusion），其目的就是“重新定义、解释并制约我们应对环境议题的思维方式”。^[29]当标出项被有意生产出来，并置于环境正义话语框架中，环境议题不仅作为一个“问题”被建构出来，而且在修辞学意义上被转化为一个逼真不过的歧视问题（如户籍歧视、贫富歧视），这便是环境正义话语生产的接合原理。

四、结语：通往环境公共事件研究的符号学路径

总之，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的话语运作过程可以概括为三个相互关联的修辞实践，分别是符号化实践、语境生成实践和话语接合实践。三者之间的“对话联系”可以表述为：符号化实践强调的是对符号的识别和选择行为，语境生成实践揭示了符号意义的赋值和生产机制，而话语接合实践则旨在强调一种“更大的意义”——话语的勾连和争夺过程。具体来说，第一，由于信息沟通的失衡或不对称状态，底层话语往往会对一切可能的自然符码体系进行符号化处理，使其成为舆论再造的“场”，这一行为对应的恰恰是符号意义的激活与召唤过程；第二，符号化过程其实是在特定的语境中完成的，而伴随文本语境和场合语境在符号意义赋值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限定和导向作用；第三，为了使得符号表意行为产生强大的社会劝服功能，公众一般会招募并挪用一定的话语方式，也就是给意义生产和社会劝服一个话语框架，进而“以话语的方式”实现公共议题构建的政治目的。

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并非一个特殊事件，而是共享了其它环境公共事件的诸多共通之处。在其它环境公共事件的舆论运作过程中，底层话语的修辞实践延续了“符号化实践→语境生成实践→话语接合实践”这一符号学分析框架。具体来说，符号化分析强调对符号的选择、激活与意义赋值行为，其结果是激活并生产了许多新的符号，环境公共事件中的流行语、网络热图、网络造句等符号体系都可以视为符号化的产物；语境生成分析强调对伴随文本语境和场合语境的特征分析，而环境公共事件中经常出现的“新闻合订本”和“新闻要对照着看”其实就是一种最典型的语境生成策略；接合实践分析强调一种话语的生产与再造行为，也就是将环境议题巧妙地转化为相应的法制话语、全球化话语、公民权利话语、社会正义话语等话语形态，进而在某种话语框架中进行公共议题建构。因此，“符号化实践→语境生成实践→话语接合实践”可以视为环境公共事件分析的一种可供借鉴的符号学分析框架、路径和方法。

当然，符号学分析环境公共事件并无一个标准的模式或套路，本文仅仅提出了一个可能的分析框架，更为丰富而多元的符号学分析框架还有待进一步提炼和验证。

